

# 小小十年

## ——《二十一世紀》與《學人》

汪暉



最近幾年來，大陸知識界很少真正的討論，許多有價值的命題往往成為媒體中爭吵和格鬥的由頭，互貼標籤而後加以討伐更是常見的形式。在這樣一個高度政治化而又無法直接討論政治問題的環境中，《二十一世紀》能夠組織重要的討論已經極為不易。

桌頭放着兩摞刊物，一份是《二十一世紀》，另一份是《學人》。這兩份刊物的誕生與80年代末的風雨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90年代初期，大陸的民間刊物完全消失，曾經輝煌的學術刊物風光不再，即使是《讀書》也難以像80年代那樣暢所欲言。《二十一世紀》在這一情境中成為大陸知識界難得的公共空間。倘若要談論1989年以降的中國思想狀況，《二十一世紀》的作用不言自明。在我的記憶中，構成90年代思想史的一些主要議題，如有關近代中國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的論戰、國家能力問題的論戰、制度創新的論戰，等等，都是在這份刊物上首先刊出，而後擴展到大陸其他出版物上的。最近幾年來，大陸知識界很少真正的討論，許多有價值的命題往往成為媒體中爭吵和格鬥的由頭，互貼標籤而後加以討伐更是常見的形式。在這樣一個高度政治化而又無法直接討論政治問

題的環境中，《二十一世紀》能夠組織起這類重要的討論已經極為不易了。我希望這類討論能夠繼續地展開。

看着這些刊物，我不免想到90年代初期的情形。在1989年之後的時期裏，知識界面臨巨大的壓力，也承載着深刻的歷史挫折感。但據我的記憶，當時的討論氛圍比現在要好一些。我因此願意回顧一下那時的情景，雖然許多事情已經記憶不清楚了。關於《二十一世紀》，談的人已經很多。在紀念這份刊物十周年的時刻，我願意談一談90年代中國大陸第一份由知識份子自己創辦的學術刊物《學人》，也許可以顯示出90年代大陸學術環境的某一方面。在《學人》創刊之後，民間刊物不斷湧現，我們三位編輯為此感到欣慰。兩年多以前，一直資助《學人》出版的高筒光義先生的公司破產，日本的伊藤虎丸教授、尾崎文昭教授、窪田忍教授和高橋信幸教授從自己的工資中抽取了部分資金資助《學人》最後三輯的出版。在這樣的情況下，也考慮到我們三位編輯的工作情況，我們決定暫時中止《學人》的出版。去年10月，在離京赴美的前一天，我編輯完了《學人》叢刊的最後一輯（第十五輯），並在與陳平原、王守常商量的基礎上，撰寫了簡短的暫

停出版《學人》的說明。在我7月間回到北京的時候，一再拖延的《學人》第十五輯剛剛出版，歷時十年的編輯工作告一段落。在中國現代歷史中，民間刊物層出不窮，但大多短命，有些一二年，有些三五年，能夠堅持到十年的刊物，並不多見。在90年代初期，這份在大陸創刊的叢刊與在香港創刊的《二十一世紀》相互呼應，反映了在不同學術環境中的不同的取向。過去十年中，《學人》默默地做事，靜靜地出版，即使出現了有關的報導或者議論，我們也不作回應。這是我們三位編輯人在創刊伊始就相互約定的。現在《學人》的工作告一段落，十年勞作，也許應該說點甚麼。對於讀者、對於關心和幫助過《學人》的朋友們，這是一種交代，一種從我個人的經驗出發的交代。

《學人》創刊於1991年，但創刊的最初動議則是在1989年的秋冬。那年的12月已經十分寒冷。幾位從未謀面的日本朋友從東京來到北京：高橋信幸先生，高筒光義先生的清掃公司的一位女士。在北京和平飯店，我還見到了他們請來幫忙的、當時在復旦大學進修的法律專家黑田先生，此外，時在北京大學攻讀中國哲學史專業的窪田忍先生也在座。1989年夏天之後，伊藤虎丸教授、丸山升教授、尾崎文昭教授等幾位東京的中國學家出於對中國知識份子的關心，建議高筒和高橋（後來日本的朋友戲稱他們為「雙高」）幫助中國的朋友們。他們因此成立了國際友誼學術基金會籌備委員會，希望以高筒先生的公司的一些資金為初始基金，再吸引其他公司或機構加入（這一構想似乎並未實現），支持國際學術、特別是中國學術的事業。中國學家們向高筒先生、高橋先生介紹了一些北京的朋友和學者。高橋先生一到北京，按圖索驥，與多位

學者取得聯繫。那天與林崗、孫歌兩位一道去賓館見他們，在門口見到陳平原和黃子平正從裏面出來，知道他們已經與日本朋友見了面，但並不知道談了些甚麼。進到屋內，寒暄之後，高橋先生便介紹他們的來意，說是1989之後，日本的一些朋友非常關心中國知識界的情況，希望能夠做點事情，促進中日兩國真正的民間交往。他們打算向國家教育委員會申辦一所民辦的大學，所以特別請了法律方面的專家黑田先生一道來北京。在1989年的灰色氛圍中，這些話聽起來與其說是鼓舞，莫如說像天方夜譚。我直率地說，這是不可能的，又建議說，能否請他們資助出版一份學術性刊物？即使這個保守的建議，據我所知，北京的朋友們也是不相信能夠實現的。高橋先生未置可否，但兩年以後再見高筒和高筒兩位先生時，他們對我說，這項建議讓他們深受鼓舞。辦大學的事，果然在接觸有關方面之後，就不了了之了。

為甚麼「雙高」會主動支持中國的知識份子呢？伊藤虎丸教授、尾崎文昭教授等日本學者的鼓勵是一個重要的原因，1989在全世界關心中國社會命運的人們中激發起的激情是另一個原因。但「雙高」本人的意願是最為直接的動因。高筒先生是一家規模不大的清掃公司的董事長，高橋先生則是三鷹市政府老齡問題對策室的官員，他在39歲時來中國學習漢語，熱心於中日兩國的民間文化交流。他們是在法政大學唸書時的朋友和同學。那個時期正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也是全球各地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革命時代。他們兩位積極參與了當時的學生運動，高筒還是法政大學的學生會主席。在運動中，他們分別被捕入獄。出獄之後，高筒離開大學，繼承家業，成為清掃公司的董事長。高橋

《學人》於1991年創刊，但創刊的最初動議則是在1989年的秋冬。1989年夏天之後，伊藤虎丸、丸山升、尾崎文昭等幾位東京的中國學家出於對中國知識份子的關心，建議高筒和高橋幫助中國的朋友們。他們因此成立了國際友誼學術基金會籌備委員會，支持國際學術、特別是中國學術的事業。

我記得就在北京市解除戒嚴的那一天，一些朋友湊了一點午飯錢，委託《讀書》雜誌召集了「六四」之後的第一次知識份子聚會，希望能夠重振旗鼓，做點嚴肅的學術工作，並以學術研究的方式總結我們在80年代經歷的過程和失敗。

出獄後進入三鷹市政府工作，因為有過入獄經歷，不能分配到更好的部門工作。那時的老齡對策室是許多人並不願去的。但高橋極為勤勉地工作，並自費調查瑞典、美國和中國的社會福利狀況，仔細地設計三鷹市政府的老齡對策問題。在他長期的努力之下，三鷹市成為日本全國處理老齡社會福利的典範城市，高橋本人也因撰寫了一本老齡福利的著作而獲得了日本社會的廣泛關注。三年前，他放棄了三鷹市的工作，到九州的一所大學擔任社會福利方面的教授職務。這是我所見到的兩位成長於60年代的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承認運動的幼稚和失敗，但在他們的內心裏，從未放棄年輕時代的理想。當他們擁有了一定的條件的時候，他們願意為他們的理想償付代價。我記得《學人》創刊之初，高筒先生帶着他的公司的幾位高級職員來到北京，會面之後，他的同事們對我說，高筒先生每次從北京回到東京後總是對他們說，《學人》的工作真是「有意思」。高筒先生並不懂中文，在起初，他支持我們的工作主要是為了幫助他的朋友做事。只是在結識了我們幾位之後，他才開始感到了一種「意思」。但甚麼意思呢？公司的同事們並不理解。高筒因此請他們來與我們幾位編輯見面。他的同事說，現在他們明白董事長所說的「有意思」是甚麼意思了。我想，他所謂的「意思」是包括對我們的工作的理解和尊重，對於在共同工作中產生的友誼的尊重。《學人》的實踐意味着：在一個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相並而行的世界裏，在一個拜金主義盛行的時代裏，一種不謀求任何私人利益的真正的國際主義是仍然可能的。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學人》每出版一輯，高筒和高橋兩位便來北京一次，除了支付稿費、出版費用以及討論有關《學人》的事宜之

外，我們有許多的機會在一起聊天，成為真正的朋友。

那麼，為甚麼在1989年的那個冬天，我和朋友們會建議出版刊物呢？這也不是一時的想法。就在這些日本朋友來北京之前的一個月，我記得就在北京市解除戒嚴的那一天，一些朋友湊了一點午飯錢，委託《讀書》雜誌召集了「六四」之後的第一次知識份子聚會，希望能夠重振旗鼓，做點嚴肅的學術工作，並以學術研究的方式總結我們在80年代經歷的過程和失敗。我記得會上兩種意見較為突出，一種是消極的，覺得在政治狀況沒有改變之前，知識界不可能有所作為；另一種意見較為積極，覺得即使無法直接討論我們當下的問題，也應該堅持學術研究，對我們自身進行反省。在那次會上，我引用了韋伯 (Max Weber) 《作為學術的志業》 (*Wissenschaft als Beruf*) 中的話，試圖為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某種倫理的基礎。這些想法在「六四」之後與靳大成、陳燕谷等幾位朋友的私下討論中已經成為共識，即在最為困難的環境中，也不應該放棄學術研究，而當務之急，則是對近代思想和學術加以整理和檢討，試圖以歷史研究的方式來反省我們在80年代末期遭遇的挫折。但我們沒有自己的刊物。在這樣的背景下，當「雙高」問及我的意見時，我提出了創辦刊物的建議。也是因為這些原因，雖然後來《學人》由平原、守常和我具體編輯，但在我的心目中，這份刊物是北京知識界許多朋友的共同刊物。我們三位無非是在寫作之外，做些具體的編輯和聯絡工作罷了。

與日本朋友最初的見面之後，我自己的生活的也發生了變化。先是運動過後的種種周折，而後是奉命去了秦嶺深處的商洛山，一呆就是大半年。1990年10月回到北京時，北京的情境

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這期間，大約是在這一年的5月，伊藤虎丸教授所在的東京女子大學邀請了孫玉石、黃侯興、陳平原、王守常四位訪問日本，進行學術交流。資助這項活動的，就是剛剛成立的國際友誼學術基金會籌備委員會。回京後，平原、守常和窪田幾位曾經在孫玉石老師的家中商談過一次出版刊物的事情。在我回到北京之後，出版刊物的事情重新啟動，經過多次的、各方面的協商，由守常、平原和我三位擔任編輯人。1991年的年初，一個寒冷的早晨，我們邀集了一些朋友在北京大學勺園聚會，議題是學術史問題，實際是首次向朋友們通告出版《學人》的計劃。除了我們三位編輯人之外，我記得有梁治平、錢文忠、葛兆光、劉東、閻步克、陳燕谷、靳大成、雷頤、王煒、窪田忍等，龐樸先生也在座。此後不久，1991年的3月，我和張立文、錢理群、陳來三位一道訪問東京，參加由國際友誼學術基金會籌備委員會資助召開的第二次研討會，我記得議題是「現代化與民族化：亞洲現代化過程與其民族性因素」，會議以「儒教對於近現代智識者深層精神結構之影響」為中心，分「西方近代科學與朱子學圍繞『格致』概念」與「魯迅的『歷史中間物』意識」兩個子題。在日本期間，伊藤教授、尾崎教授和「雙高」與我就刊物的出版問題做了討論。

那一年，適逢尾崎先生來北京大學作訪問研究一年，我們三位編輯者因此有許多機會與他共同討論出版的工作。我們最初曾經建議尾崎先生擔任編輯，負責徵集日本學者的稿件。尾崎先生後來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出於各方面的考慮，他沒有列名擔任編輯。在《學人》出版之前，我們主要討論了三項議題：一是刊物的標題，二是由哪家出版社出版，三是刊物的宗

旨和方向。先說刊物的標題。我們三位各自拿出了方案，但意見不統一。最後王守常說，文化書院曾經有過出版一份刊物的計劃，後來擱淺了，題目就叫《學人》。據說還請啟功先生題寫了刊題。平原和我也覺得這個題目與刊物的宗旨有些接近，於是接受了守常的建議。關於刊物的出版，我們首先選擇的是三聯書店，平原和我曾經專門為此拜訪過當時三聯的總編輯和總經理沈昌文先生，他請我們直接與一位編輯聯絡此事。多次商談後的結果是三聯同意出版，但不能保證我們希望的交稿後半年內出書的要求，同時需要的出版補貼也比我們能夠支付的多。1991年春節的時候，我回揚州探望父母，見到大學同學吳星飛先生，他當時剛剛出任江蘇文藝出版社的社長。我同他一說《學人》的計劃，他立刻表示願意承擔此事，能夠保證出書的時間，經費也比北京便宜一些。我回北京之後，與平原、守常通報情況，他們都覺得可以。尾崎先生說，刊物不在北京出也好，因為我們的目的是靜靜地做事，不多聲張。這在當時也許是最好的選擇。從1991年起，《學人》即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朱建華先生擔任責任編輯，直至今年的最後一輯。

一個刊物能夠做好，關鍵還是刊物的宗旨和目標，以及實現這些宗旨和目標的能力。在勺園聚會之前，一些朋友已經開始了學術史方面的工作，我自己的精力則更多地集中於近代思想史方面。所以，當平原建議那次討論會以學術史、學術規範等作為議題的時候，守常和我也都同意，周圍的朋友也贊成，雖然我心裏知道每一個人對於學術史和學術規範的理解是不一樣的，進入的角度也是不一樣的。學術史研究是一個專門的領域，為甚麼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時期，許

1991年的年初，一個寒冷的早晨，守常、平原和我邀集了一些朋友在北京大學勺園聚會，議題是學術史問題，實際是首次向朋友們通告出版《學人》的計劃。除了我們三位編輯人之外，我記得有梁治平、錢文忠、葛兆光、劉東、閻步克、陳燕谷、靳大成、雷頤、王煒、窪田忍等，龐樸先生也在座。

在一個政治上無所作為的時代，知識份子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並把自己的道德激情轉化為一種立身處世的方式。當時的共識似乎並不是直接介入政治問題，而是力求形成相對獨立的學術領域，不至於讓學術研究迅速地轉變為另一種政論。而嚴謹的學術研究是我們理解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重要途徑。

多學者會對這樣一個似乎遠離政治問題的領域感興趣呢？為甚麼各個不同領域的學者願意就這一其實難以清晰地加以界定的領域發表各自的看法呢？回想起來，有幾個原因。第一，1989年之後知識界對於89年社會運動進行反思，其基本的趨向與《二十一世紀》正在展開的有關激進主義的討論相互呼應。許多學者認為1989年的社會運動在方式上不夠成熟，這與80年代社會思潮的特點有所聯繫。因此，如何理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就成為一種內在的要求。學術史似乎從學術和政治兩個層面提供了一種討論相關問題的空間。第二，從當時大陸的客觀條件來說，即使那些最為關心直接的政治問題的學者也不可能發表政論性的文章，這一點與《二十一世紀》的情形極為不同。人們必須找到相對安全的學術空間，藉以展開自己的思考。第三，在我看來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即，上述兩個方面與知識份子的重新定位存在內在的關係。在一個政治上無所作為的時代，知識份子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並把自己的道德激情轉化為一種立身處世的方式。這一際遇恰恰與學者們的反思相吻合。學術的專業化就成為這一方式的表達。在我的記憶中，如何處理政治與學術的關係是許多學者思考的問題：我們剛剛經歷或者說正在經歷一場社會動盪，處於極為嚴峻的政治氛圍中，但當時的共識似乎並不是直接介入政治問題，而是力求形成相對獨立的學術領域，不至於讓學術研究迅速地轉變為另一種政論。89年的失敗使得大家意識到那種過度的政治激情會影響人們的判斷力，而嚴謹的學術研究是我們理解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重要途徑。

《學人》從一開始就以學術史和學術規範作為自己的議題是與上述思考有關的。學術與政治無法分割，但即

使是討論政治或其他急迫的社會問題，也需要嚴肅認真的研究。或者說，問題越是迫切，也就越是需要認真的、獨立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上，《學人》堅持學術的內在規定性是必要的。但學術的意義並不取決於通過學者的自我界定，真正起着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學者本身的素養、視野和判斷力。學術研究的嚴謹性就是這些素養、視野、判斷力的體現。然而，在1989之後的情境中，這些想法事實上造成了一種曖昧的知識情境，即既要以學術的方式介入歷史和社會，又要以「學術的」（而非「政治的」）方式來呈現自己。學術史、學術規範成為一時間的話題是隱含了某種政治性的，但恰恰在它成為話題的過程中隱含其中的那種微妙的政治思考似乎逐漸地消失了。重新反思90年代中國大陸知識界的思想歷程，這一有關學術史的討論有許多值得總結的地方。《學人》在這方面的實踐為學術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契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如果考慮到當初的出發點，不能不承認那時的思考本身存在着模糊的或不清晰的方面。僅僅依賴學術方式的轉變並不能保障我們具有開闊的歷史視野和思想視野，有時候所謂純學術研究也會墮入另一種隨波逐流。隨着90年代中國社會、包括中國教育制度的發展，有關學術史、學術規範的討論為學術的職業化和專業化過程提供了口號和示範，但通過這些討論來重新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和實踐的動機卻日漸地被掩蓋起來。從我個人的觀察來說，《學人》的內容比較廣闊，學術史研究僅僅是其中一項。除了十五卷、約八百萬字的論文之外，《學人》最大的成績是：在一個鬱悶和壓抑的時期裏，它為許多有志於學術工作的中、青年學者提供了空間，也為這一代學人的成長提供了園地。我

自己沒有能力估價《學人》在學術上的貢獻，但有一點還是清楚的，這裏的絕大部分成果與媒體中的時論形成了重要的對比。今天活躍在人文和社會科學若干領域的學者中，相當一部分都是《學人》的作者和朋友。就我個人而言，1989年後的思考和研究與《學人》的編輯出版有着密切的關係。

十年過去了，《學人》的使命也告一段落。也許有一天，我們自己，或者年輕的一代，還會重新開始《學人》的事業。這十年中，中國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轉化，當年的知識界也發生了難以挽回的分化。這就是歷史，是我們自己經歷的、就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的歷史。我偶爾想起當年的情景，心情是複雜的。在一個危機和壓抑的時代裏，人們相互之間保留着的尊重和理解、執着和堅毅是讓人感動的。倡導對學術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倡導尊重基本的學術規範，這曾經成為一時之間大陸人文學術界的重要話題。如果對照今日的實踐，對照近日「媒體學者」和「媒體知識份子」的實踐，那些在一個特殊時期支撐學人們立身處世的原則既顯得珍貴，又何其脆弱！將所有這一切歸咎於環境的專制是容易的，但它解釋不了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在90年代初期更為壓抑的時期，學人們反而能夠表現出更多的自律、寬容和使命感，更多的對於學術和思想事業本身的尊重。學者和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是和知識實踐密切相關的，它應該能夠落實為一種工作的倫理，而不是說給別人聽的大話，這是《學人》創刊伊始的初衷。聽說已經有人把瀟灑於我們周圍的謾罵、紛爭、誹謗和攻擊說成是民主的演練，我也相信一定會有人將這一切表述成知識份子的「獨立精神」和其他甚麼的，在我看來，這就好像說麥卡錫主義等同於民主實踐一樣的荒謬。中國社會取

得了許多了不起的進步，學術的事業有了一點發展，但一種認真討論問題的氛圍、一種以學術的研究來介入社會問題的方式卻並沒有真正養成。我把這看作是我們自己的失敗，一種深入我們學術共同體的骨髓之中的失敗。沒有甚麼堂皇的理由可以為這種失敗辯護。

但是，把所謂「知識界」的紛爭看作是中國大陸學術界的全部是不真實的。媒體製造的狂歡僅僅是一種幻象，幾個人的表演也代表不了中國的知識界。我自己孤陋寡聞，但仍然能夠看到為數不多卻也不能說太少的朋友和學者的堅韌努力，看到他們在默默的研究和思考中呈現出的力量。與媒體中的各種喧囂相比，這些沉默的努力看起來是微弱的。但是，有時候沉默是必要的，有時候孤立地探究是必要的。最為重要的是，即使面對誤解甚至攻擊也毫不動搖地進行探索。這是學者的使命，也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份子的命運。《二十一世紀》發表的一些文章曾經引發過激烈的爭論，但今天有誰能夠完全否定那些獨立的探索者的工作？回顧過去十年的討論，留給我們最深記憶的文章就包括了那些備受攻擊的文字，這些文字隨着時間的流逝而顯示出的歷史預見正在為許多人所理解。同樣，回顧過去十年的學術成果，能夠重新引起我們注意的許多作品恰恰是那些經過長期的積累和研究卻未必引起轟動的研究（我並非說引起轟動的作品就不是非常好的研究），這再一次說明學術工作對於持續探索和積累的需求。所有這一切多少讓我覺得《學人》做過的工作沒有白費。這份刊物創刊時代的那種認真和熱誠，值得我和我的朋友們懷念。

汪暉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研究員

聽說有人把瀟灑於我們周圍的謾罵、紛爭、誹謗和攻擊說成是民主的演練，我也相信一定會有人將這一切表述成知識份子的「獨立精神」和其他甚麼的，但一種認真討論問題的氛圍、一種以學術的研究來介入社會問題的方式卻並沒有真正養成。我把這看作是一種深入我們學術共同體的骨髓之中的失敗。沒有甚麼堂皇的理由可以為這種失敗辯護。